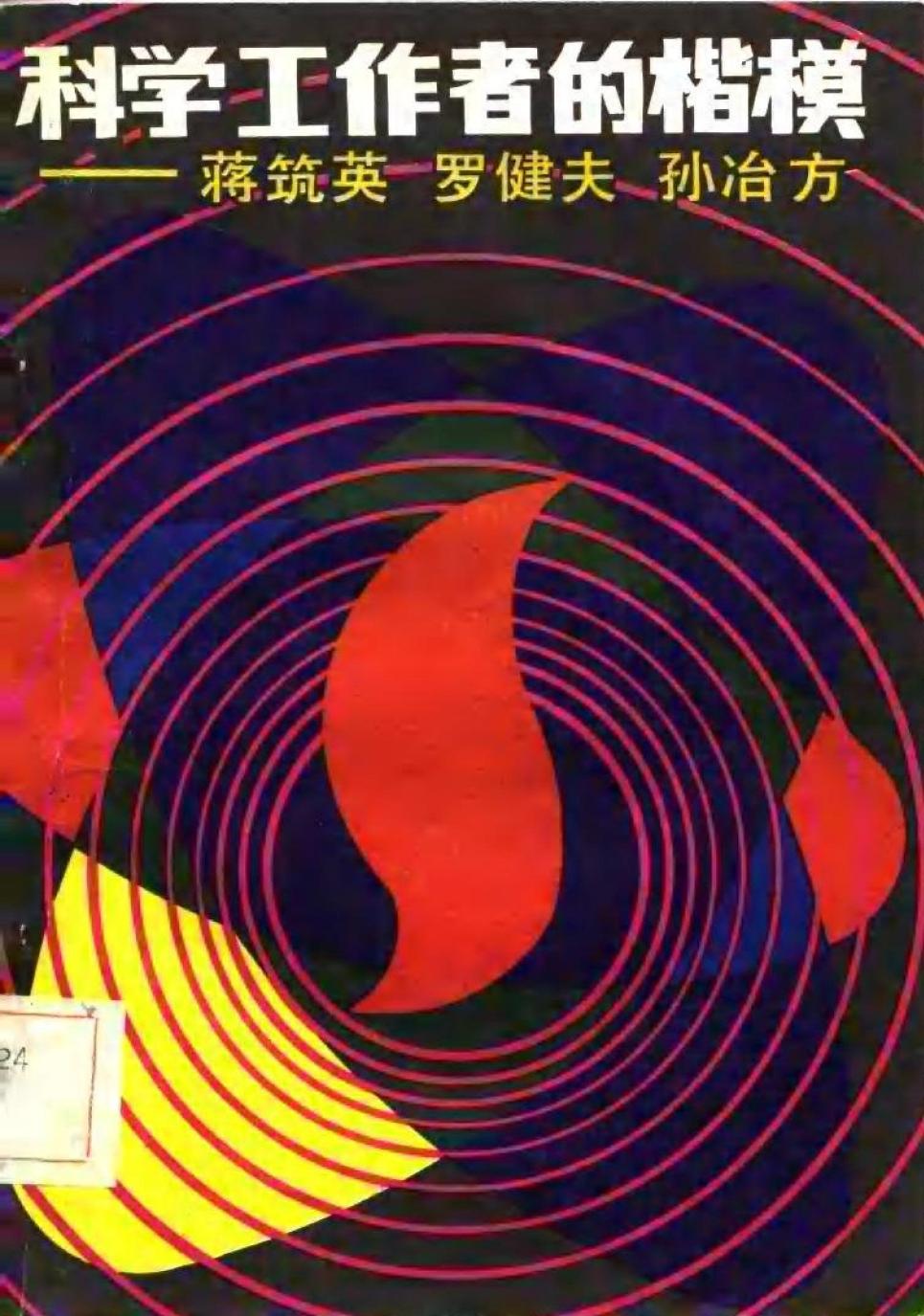


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蒋筑英 罗健夫 孙治方



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蒋筑英 罗健夫 孙治方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闻

封面设计：蒋敏学

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蒋筑英 罗健夫 孙冶方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市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5 字数：76.000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116·421 定价：0.29元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年科学家
蒋筑英同志和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中年工程师
罗健夫同志……在我们国家所急需的科学技术
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发
明创造，都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们从开始工
作的时候起，就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废寝忘
食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全部精力和
智慧，直至身患重病，仍然顽强工作。他们遇
事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把党和国家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们的
事迹是人们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教材。我们
希望全国科学界、技术界、知识界和各行各业
的全体党员、团员、全体爱国青年和全体劳动
者，都以他们为榜样。

——摘自赵紫阳《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重病中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就翻两番必须主要依靠技术改造的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于11月19日《人民日报》。他指出，“基数大，速度就低”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而主要是忽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只要不再“冻结技术”、“复制古董”，有重点有步骤地把几十万个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做好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就一定会快起来。他建议，应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国务院认为，这些论点是正确的。

——摘自赵紫阳《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目 录

痛惜之余的愿望	1
信念的力量	6
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	9
——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	
生命之箭	28
——记中年光学家蒋筑英的开拓精神	
永存的慰藉	38
怀念蒋筑英同志	41
罗健夫	45
罗健夫的人生之路	59
罗健夫——一个纯粹的人	63
向罗健夫同志学习什么？	65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委员会关于授予 孙冶方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68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71
——刘国光谈模范共产党员孙冶方	
探索真理的人	82
——记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事迹	
学习孙冶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好学风	91
孙冶方在医院	103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110

痛惜之余的愿望

胡乔木

一个多月来，光明日报几乎每天登载着模范党员、吉林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同志的事迹和纪念他的文章，工人日报几乎每天登载着模范党员、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同志的事迹和纪念他的文章。这两位同志，一位6月15日在成都去世，终年仅四十三岁；一位6月16日在西安去世，终年仅四十七岁。方毅同志、倪志福同志和其他同志，还有一些重要的党组织，都已经写了文章或作了决议，号召大家向他们两位学习。确实，这两位同志的事迹，同在他们先后去世的模范共产党员赵春娥、张华等同志的事迹一样，太令人感动了。我想，绝大多数读者，读了介绍和纪念他们的文字，很难不流下泪来。我们党有多么高尚圣洁的党员，我国人民有多么忠贞坚毅的儿女，他们的伟大品质叫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党和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目标的保证。同时，损失了他们，损失了对祖国作出了如此多的重大贡献而又刚走在生命中途的他们，又多么叫人难过！我们活着的同志要多么努力，才能弥补他们的不幸的过早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

我现在既不必要、也不能够和忍心重新叙述他们的事迹

和品质，这些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报道，请读者找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去看（主要是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和11月5日工人日报的《罗健夫》）好了。我只想在痛惜之余，说出几点愿望。

首先当然是希望大家（不限于知识分子，而是一切党员、团员，一切觉悟的青年和觉悟的劳动者）都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以及那些一味争名夺利，甚至对社会主义祖国至今还三心二意，羡慕资本主义“天堂”的人们，多读读他们的事迹。他们所做的一切，有许多是一般人所不容易做到的。他们是科学专家，是我国科学发达和经济振兴的主要希望所寄，他们不断苦学得来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专门知识不是人人轻易能够掌握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不移的忠诚（这种忠诚无论他们在身处逆境和身处顺境的时候都始终没有变化）；他们全心全意地为着人民的和别人的利益着想，一贯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只要是祖国和人民向他们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不管是份内的和份外的，不管是他们原来学过的还是没有学过的，他们都勇敢而顽强地努力钻研，他们一贯地不知道疲倦、忘记了饥渴病痛地劳动；这些高贵的品质，却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任何一个爱国志士（我们不要忘记，蒋筑英同志虽然生前填了入党申请书，却是死后才被吉林省委追认为正式党员的）所能够和应该学习的。即令我们每个人只能学习到他们所作到的一半的程度，汇合起来，也就是一股了不得的力量，足以战胜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

其次，我想说，希望一切先进分子所在机构中的党组织、每个党员以至每个正直的公民能够更多地更好地关心这些先进的人们。确实，除了在那个使我们大家都痛苦的时期以外，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长春光机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没有照顾好蒋筑英和罗健夫。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仍然不能不想到，在这些方面未必没有许多欠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人啊，共产党员啊，你们没有权利对周围的人和事冷漠敷衍。就说蒋筑英吧，已经经过了这样长久的考验，难道他入党的志愿，也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由省委的追认而满足么？当然，我并不了解这两个党组织对这两位同志关系中的细节，但是也正因为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两个党组织的有关说明，我不能不作为假定提出这个问题。我的愿望不是单对着这两个机构说的，也不是单对着中年知识分子说的，我是对着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全体爱国公民说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到处都有先进分子，到处都有最可爱的人。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悔吧！

第三，我也想对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等同志说几句话。共产党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是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为了十亿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我们不是那种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值得”为一个农民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人，那样的人，如果是在别的岗位上，当然也不会冒死去抢救一个

小学生，或者同一个甚至几个拿着凶器图谋犯罪的歹徒格斗。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想，蒋筑英和罗健夫都并不是必然要死（我不懂医学，不知道罗健夫同志所患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和蒋筑英同志所患的多种凶险疾病能不能在早期治愈，这里是假定能够）。如果他们还健康地活着，尽管报纸上不会这样大量地表扬他们，但是他们却能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多更重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经常提倡自我牺牲，但是这不是说一个共产党员或先进分子的生命和健康就不重要。生命和健康，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资本，它们不是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对于党员，就是属于党的。我们反对借口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而损公利私，而贪生怕死，但是有了病，特别是有了严重的病，还是要治，并且要治好。这好比打仗，打仗一定要不怕死，但是也一定要尽量争取少死，受了伤，只要有可能，还是要争取治愈重返前线。共产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的自我牺牲的目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自己（更不必说别人）的痛苦，而是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幸福。除了不可避免的死亡者以外，我们只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活着、奋斗着，才能带领人民一起去胜利地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末了，我还有一点愿望，是关于新闻界的。工人日报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航天工业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同志，这证明工人日报确是忠于党中央的政策，把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工人日报和光明日报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专长，这也是一件好事。不过就我有限的见闻所及，除了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过一篇《吉林省委决定开展

向蒋筑英学习活动》和新华社播发的《许多读者投书工人日报表示学习罗健夫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解放军报同日发表了关于学习罗健夫的一篇本报讯，吉林、陕西两地的报纸也分别作了有关的大量报道以外，其他报纸似乎都很少涉及这样两位有全国意义的模范人物。分工分到这样“专门”的程度，不免使人们感到惋惜。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虽然都拥有大量读者，范围究竟比较有限，这就使得全国很多人至今还不了解蒋筑英、罗健夫这两位模范党员的丰功和美德，不了解他们艰苦奋斗的历程。我因此希望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要这样过分地井水不犯河水，好让大批读者、听众和观众更容易知道尽可能多的事实，得到他们所需要得到的教育。

（转自1982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信 念 的 力 量

宋 振 庭

夜深了，四周一片静谧。柔和的台灯光下，报纸上蒋筑英、罗健夫的肖象，用其睿智的目光凝视着我，似乎在问：同志，你在想什么？

我仿佛又陷入在学生时代遇到老师冷然提问时的窘境。我想的太多了，一时回答不清，然而这又是应该回答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垂下头去。

我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同蒋筑英同志所在的光机所有工作联系。我多次看过他们制造出来的高、精、尖的光学仪器，我曾为之赞叹，为之兴奋，为之鼓舞，为之自豪，但是遗憾的是，我不曾同这位为事业付出毕生心血的蒋筑英同志谋过一面，不曾握一次他的手，不曾向他致过一句慰问，我深深地感到惭愧。

蒋筑英、罗健夫，多好的同志啊！你们想要为祖国献出的——知识和力量，你们已经全部贡献了；你们不想向人民索取的——光荣的名誉，人民理所当然地奉赠给了你们。你们生活的时间不算长，尤其是有效的工作时间那么短暂，然而你们的生命却迸发出灿烂的光辉！人生的价值是不能以久暂来衡量的。你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育，你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你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壮丽的共

产主义事业，给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昭示了楷模，你们可以毫无惭愧地安息了。

当感情的潮水渐渐平静下来时，人们自然要想：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两位同志自强不息地拼搏了一生？我读过报上所有报道后，得出一个结论：信念，坚定的信念！我为纪念张志新烈士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唯真知出大勇》，蒋、罗两同志虽然和张志新经历不同，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角度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全部生涯中，贯穿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生，而工作和奋斗，而死。

蒋筑英、罗健夫两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都曾遭到过不同程度的不公正的待遇。可贵而难能的是，他们自幼接受党的教育树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念丝毫不曾动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语），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传到蒋筑英、罗健夫身上，又赋予了共产主义的全新的内容。

用鲁迅的话说，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流出的是血。

请看：蒋筑英同志与其爱人路长琴同志定情的赠品仅仅是四尺蓝布！他生活在我们同时代，用的一直是一只老怀表。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他才第一次穿上的确良衣服，而且是弟弟送的！要知道，这是才华横溢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啊！我不知道一些青年同志读到这些作何感想，我却流泪了。

请看：罗健夫同志在事业上做出不同一般的贡献后，拒

绝高级工程师的头衔，谢绝调工资，不要好住房，把出国的机会让给他人。在癌症危及生命时，他想的是充分利用每分每秒时间安排工作，不坐汽车，不要沙发，甚至住房也怕给将来的房客带来不舒服。要知道，以他的贡献他本可以要求更好的待遇，然而他却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少麻烦人。”我不知道一些总爱因待遇问题发牢骚的同志读到这些作何感想，我却流泪了。

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无如此优秀的知识分子，大概总会有的吧。但我仍要为我们的蒋筑英、罗健夫感到骄傲，为我们的党和祖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人才而感到骄傲，同时也为许多活着的、同蒋、罗两同志一样为四化事业奋战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有一种坚韧不拔、刻苦钻研、严于律己、一心为国的高尚精神，并且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同共产党建立了血肉联系。我们的祖国还很贫穷，不能给他们更好些的待遇，但是他们对祖国永远一往情深，为之呕心沥血，直至献出生命。蒋、罗二同志就是典型代表，他们的品质，是人类良心的结晶。这两位同志同一切先辈革命者一样，是中国的脊梁。这两位同志的出现，本身就昭示一条真理：中华民族一定会繁荣昌盛，黄帝子孙一定要在世界东方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化事业必定成功。

愿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们和党和人民一道，继先驱者的遗志，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

（转自1982年12月3日《工人日报》）

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

——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

《光明日报》记者 陈嵩山

人们在追悼会上恸哭

在摆满鲜花和花圈的灵台上，挂着一位中年人的大幅遗像：一头黑发，瘦长脸儿，长得很英俊，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好似深情地瞧着俱乐部大厅里正在垂泪的人们。不少人举目仰望灵台上那张熟识的面容，禁不住失声恸哭。这哭声和那低回的哀乐声在大厅里萦回，穿过窗户，飘向蓝天……

这是今年7月8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次破格追悼会的情景。被追悼的人叫蒋筑英，是这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灵台两侧贴着的那副挽联，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
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

灵堂的墙上挂着许多挽联、挽幛，既有本单位的，也有外单位的，既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从全国各地还发来了一百多封唁电、唁函……

追悼会开成这般隆重，完全出乎研究所领导的意料之外。蒋筑英不幸去世，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他们决定召开五百人参加的追悼会。可是，许多人戴着自做的白花，带着

花圈、挽联、挽幛自动来到灵堂，把容纳一千多人的研究所俱乐部挤满了。

大家这样来悼念这位中年死者，他生前在人世间到底给人们心里留下了些什么呢？

当他步入人生的时候

他出身于杭州一个旧职员家庭，在旗下成长。当他步入人生的时候，社会给他的既有蜂蜜，也有苦酒。他的父亲是旧社会的过来人，有些政治历史问题，1954年被错判入狱。但他相信党，相信革命事业。他努力学习。两年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有八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要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应家庭。他是长子，懂得母亲的艰难，深知母亲的苦楚。但他追求的是事业。他学的专业是光学专门化。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东北，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在东北。岂能燕雀恋窝，要学鹏程万里。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这就是他走向科学迷宫的起点。

攀 高 峰

当他挑着简易的行李跨进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大门时，谁也看不出这个高瘦个儿的青年人身上有什么闪光的

东西。经过几次接触后，王大珩看出来了：他质朴、正直、勤奋，进取心极强，对学习和工作，有着火样般的热忱，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楼梯一步跨两级。这些品质和劲头，是科技工作者最可贵的。科学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

六十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这个科研领域，我国尚是个空白。王大珩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蒋筑英选定光学传递函数这一研究课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蒋筑英开始攻关了。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困难面前却步。他对伙伴们说：“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七百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了这套装置后，深为惊异，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人生三十而立。蒋筑英和伙伴们搞出这台高精度的装置时，还不足三十岁。

“中国人有内行！”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